

# 新冠肺炎疫情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

龚 顺 叶茂鑫

**摘要:**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前后两期“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前后中国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整体处于较高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进一步提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提升程度更大。研究结果表明,“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新冠肺炎疫情前后中国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趋势。本研究对理解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国家认同感 新冠肺炎疫情 大学生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提升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与保持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息息相关。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深入分析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找寻提升途径,对持续增强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有关国家认同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或历史分析方面(金太军、姚虎,2014;周光辉、李虎,2016)。有关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李春玲、刘森林,2018)。一般认为,国家重大事件的发生会对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产生巨大影响。比如,有研究探讨过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对中国民众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感的影响(Yang et al.,2010)。但少有研究分析过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前后民众国家认同感的动态变化情况。

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民众来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民众抵御风险的能力存在差异。根据以灾害为代表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民众影响的差异,有研究提出“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sup>①</sup>(disaster social vulnerability theory)(Alexander 2012; Fothergill & Lori 2004; Elliott & Pais 2006)。按照这一理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民众掌握资源和财富的多寡存在差异,抵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其社会心态的影响并不相同。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民众抵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能力较弱,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其不安全感会更为强烈,国家认同感也更容易降低;而由于掌握的资源 and 财富相对较多,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民众抵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能力也较强,同样规模的突发公共事件对他们的冲击并不大,其国家认同感也更不容易降低。

基于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分析疫情发生前后中国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动态变化情况,以及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情况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由此,可以为研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动态影响提供相应依据。

---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比较视野下国际包容度城市建设的社会学研究”(20CSH052)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①</sup> “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并未限定在解释自然、社会灾害的影响上,而更多强调具有波及范围广、突发性和重大危害性特征的公共事件对民众的影响。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波及范围广、突发性和重大危害性特征。因此,本研究认为“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可用于解释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影响。

##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 新冠肺炎疫情与国家认同感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尉建文、谢镇荣 2015; 游宇等 2018)。短期来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强化了群体认同,为民族国家的团结创造了契机。这一现象可称为“团结在旗帜周围”效应(rally - round - the - flag effect) (Baum 2002)。

但是,“团结在旗帜周围”效应往往极其短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政府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效能的高低会对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产生长期影响。公共事件发生后,民众自发形成的“团结在旗帜周围”效应不仅显示了其团结意识,也体现了民众出于维护自我群体优越性<sup>①</sup>而对本国政府出台积极有效应急管理措施的强烈期望。如果政府的应急管理效能低下,会使民众对自我群体的优越性产生质疑,国家认同感降低;相反,政府高效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可以满足民众的自我群体优越心理,从而进一步提升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众所周知,2020年面对前所未有、突如其来、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在疫情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方面体现出高效的一面;加上全国民众的艰苦努力,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可以说,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措施符合民众对政府的期望,维护了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

由此提出假设1: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有所提升。

### (二) 新冠肺炎疫情、社会经济地位与国家认同感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存在普遍性,同时也会同社会结构因素相叠加,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乌尔里希 2004)。按照“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对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民众来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程度并不一样。豪威尔和埃利奥特(Howell & Elliott 2019)通过分析美国1999—2013年的数据发现,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可获得的资源有限,非洲裔美国人更容易受到灾害的冲击(比如,居无定所等)。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民众不仅在物质方面抵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能力较弱,在事件发生后也更难获得心理方面的支持,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其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Elliott & Pais 2006)。因此,根据“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可以推断,相比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影响更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可能面临一系列问题(比如,父母失业、家庭收入和生活质量下降等),他们的内心会产生巨大不安,国家认同感降低。

由此提出假设2:新冠肺炎疫情后,相比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降低程度更大。

但是,“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主要关注个体行为,却忽视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影响。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政府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效能的高低也可能影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民众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兜底和保障性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民众免受疫情的影响。因而,基于“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的研究假设在中国是否适用还值得商榷。

根据马斯洛(2012)的需求层次理论,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民众对物质和安全的需求程度更高。相比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政府对保障性政策的需求更高。因此,面对政府同样高效的应急管理、社会治理措施和保障性政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提升程度反而有可能更大。

<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泰费尔和特纳(Tajfel & Turner, 1979)提出“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根据社会认同理论,民众对自己所归属的群体具有天然的认同感,并始终有追求自我群体优越于其他群体的基本动机。

由此提出假设 3<sup>①</sup> 新冠肺炎疫情后,相比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提升程度更大。

## 二、数据与变量

### (一) 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PSCUS)。该调查以网络问卷调查为主,对中国大学生的生活、就业、价值观变迁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以教育部承认学历的高等学校为总抽样框,依照多阶段、分层、等概率的抽样原则从“学校—专业—班级”三个层次的单元进行抽样。该调查提供了丰富的大学生个体信息,有助于了解中国大学生生活、就业、价值观变迁等方面的情况(李春玲, 2019)。

“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分别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2019年11—12月)<sup>②</sup>和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2020年3月)对同一批大学生样本进行了两期追踪调查(见图1)。这两期数据较为理想地记录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后大学生相关态度变化的情况,为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研究数据。

调查随机设置了A卷和B卷。国家认同感的相关题目只在A卷中设置,因此本研究只使用了A卷的相关数据。数据分析时,删除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共有3892个样本进入分析。



图1 “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两期调查的时间轴

### (二) 变量

#### 1. 因变量

因变量是大学生们的国家认同感。借鉴已有研究(李春玲、刘森林, 2018),从五个方面测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这五个方面分别是“当别人批评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像是在批评我自己”“我经常因国家现存的一些问题而感到丢脸”“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即使有机会离开,我也会留在中国”。采用李克特量表的计分方法,回答包括“很不符合”“不符合”“不好说”“比较符合”“很符合”;从-2到2依次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越高。得分加总后得到“国家认同感”的总得分,取值范围为-10到10。国家认同感分量表的克龙巴赫系数为0.716。

① 假设3与假设2是一组对立假设。

②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疫情前调查在2019年10月1日前进行,则难以判断究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还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而如果疫情前调查在2019年10月1日后进行,则这两期调查之间只有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事件会影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这就保证数据较为客观地记录了疫情前后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情况。本研究的第一期数据是在国庆后(而不是国庆前)收集的;第二期数据是在疫情发生且得到有效控制后收集的。这种研究设计避免了累积效应。

## 2. 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变量;二是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疫情变量是二分变量。2019年11—12月收集的数据为疫情前数据;2020年3月收集的数据为疫情后数据。

大学生还没有工作,因此主要使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测量。具体来说,使用大学生的家庭月收入、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父辈受教育程度以及本人就读大学类型这四个指标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家庭月收入根据大学生对父母税后月收入估计的金额进行测量;为解释方便,对家庭收入进行了取对数转换。家庭社会阶层地位采用父亲职业地位进行测量,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工农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专业技术阶层、管理阶层。父辈受教育程度采用父亲受教育程度进行测量,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学历、大学(包括大专)及以上。此外,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就读大学的层次越高,大学生拥有稳定和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也越高(李春玲,2010)。因此,还将大学生就读大学类型作为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主要分为三种类型:高职院校、普通高校、重点高校。

##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为毕业生以及是否为湖北籍。性别变量以男大学生作为参照项。毕业生可能因为疫情影响面临较大就业压力而国家认同感较低,控制大学生是否为毕业生这一变量,以非毕业生作为参照项。此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在湖北省,控制受访大学生是否为湖北籍这一变量,以非湖北籍作为参照项。

# 三、研究结果

## (一)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国家认同感的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大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情况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我们主要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情况。

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整体较强。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平均得分疫情前为5.47,疫情后为5.83,两者都远高于分值设定(-10分到10分)的中间值(0分)。同新冠肺炎疫情前相比,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显著提升。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平均得分由5.47提高至5.83;标准差变小,由3.97降低为3.34。这表明,疫情后爱国成为更加普遍的共识。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这种提升非常难得。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普遍较高,国家认同感提升的“天花板效应”已经存在,加之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也会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仍有所提升。这表明,大学生对中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给予了积极评价。

## (二) 新冠肺炎疫情与国家认同感

表1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Pooled OLS Regression)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个体特征后,与疫情之前相比,疫情发生且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得到提升。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表1 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分析结果

	模型1
女性(参照项:男性)	0.12 (0.08)
年龄	-0.10*** (0.02)

续表 1

	模型 1
湖北籍(参照项:非湖北籍)	-0.80 (0.43)
毕业生(参照项:非毕业生)	0.10 (0.10)
家庭月收入(对数)	0.16** (0.05)
家庭社会阶层地位(参照项: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0.26* (0.11)
专业技术阶层	-0.56*** (0.15)
管理阶层	-0.59** (0.18)
父辈受教育程度(参照项:初中及以下)	
高中	-0.06 (0.11)
大学及以上	0.16 (0.14)
本人就读大学类型(参照项:高职院校)	
普通高校	0.88*** (0.11)
重点高校	0.43*** (0.11)
疫情后(参照项:疫情前)	0.35*** (0.08)
常数项	5.92*** (0.63)
观测值数	7784
R <sup>2</sup>	0.02

注:\*\*\*  $p < 0.001$ , \*\*  $p < 0.01$ , \*  $p < 0.05$ ; 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从表 1 可以看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强弱程度不同。大学生的家庭月收入越高,其国家认同感越强。对不同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的大学生来说,国家认同感的排序依次为:工农阶层最高;其次为一般非体力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国家认同感最低的为管理阶层,但专业技术阶层和管理阶层出身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差异不大。父辈受教育程度并不能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这可能在于,大学生大多已成年,父辈对其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较小。

就读大学类型则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但并非线性关系。国家认同感最强的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其次为重点高校大学生;而国家认同感最弱的是高职院校大学生。为什么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较弱?这或许是由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就业预期不太理想,获得感较低,因此国

家认同感变弱。研究也发现,中产边缘层容易产生因缺乏生活预期而社会认同感较低的问题(李强 2017)。显然,由于教育扩招、学历贬值,高职院校大学生更容易成为中产边缘层。

有关控制变量的研究发现,性别并不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但年龄大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相对较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湖北省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更大,但湖北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并没有显著低于其他省份的大学生;毕业生虽面临就业压力,但其国家认同感并没有显著低于非毕业生。

### (三) 新冠肺炎疫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国家认同感

疫情后,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是否存在差异?在表1的基础上,表2依次加入新冠肺炎疫情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具体来讲,模型1是新冠肺炎疫情与家庭收入的交互项模型;模型2是新冠肺炎疫情与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的交互项模型;模型3是新冠肺炎疫情与父辈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模型;模型4是新冠肺炎疫情与就读大学类型的交互项模型。

表2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1	模型 3	模型 4
女性(参照项:男性)	0.12 (0.08)	0.12 (0.08)	0.12 (0.08)	0.12 (0.08)
年龄	-0.10*** (0.02)	-0.10*** (0.02)	-0.10*** (0.02)	-0.10*** (0.02)
湖北籍(参照项:非湖北籍)	-0.80 (0.43)	-0.80 (0.43)	-0.80 (0.43)	-0.80 (0.43)
毕业生(参照项:非毕业生)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家庭月收入(对数)	0.25*** (0.06)	0.16** (0.05)	0.16** (0.05)	0.16** (0.05)
家庭社会阶层地位(参照项: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0.26* (0.11)	-0.10 (0.15)	-0.26* (0.11)	-0.26* (0.11)
专业技术阶层	-0.56*** (0.15)	-0.56** (0.19)	-0.56*** (0.15)	-0.56*** (0.15)
管理阶层	-0.59** (0.18)	-0.44 (0.23)	-0.59** (0.18)	-0.59** (0.18)
父辈受教育程度(参照项:初中及以下)				
高中	-0.06 (0.11)	-0.06 (0.11)	0.06 (0.16)	-0.06 (0.11)
大学及以上	0.16 (0.14)	0.16 (0.14)	0.34 (0.18)	0.16 (0.14)
本人就读大学类型(参照项:高职院校)				
普通高校	0.88*** (0.11)	0.88*** (0.11)	0.88*** (0.11)	1.08*** (0.15)
重点高校	0.43*** (0.11)	0.43*** (0.11)	0.43*** (0.11)	0.71*** (0.15)

续表 2

	模型 1	模型 1	模型 3	模型 4
疫情后(参照项:疫情前)	1.81** (0.66)	0.48*** (0.12)	0.47*** (0.11)	0.63*** (0.13)
疫情后×家庭月收入(对数)	-0.18 <sup>°</sup> -0.08			
疫情后×家庭社会阶层地位(参照项: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0.32 (0.20)		
专业技术阶层		-0.01 (0.25)		
管理阶层		-0.28 (0.29)		
疫情后×父辈受教育程度(参照项:初中及以下)				
高中			-0.24 (0.21)	
大学及以上			-0.34 (0.22)	
疫情后×就读大学类型(参照项:高职院校)				
普通高校				-0.41 (0.21)
重点高校				-0.56** (0.19)
常数项	5.20*** (0.71)	5.86*** (0.63)	5.87*** (0.63)	5.78*** (0.63)
观测值数	7784	7784	7784	7784
R <sup>2</sup>	0.02	0.02	0.02	0.02

首先,我们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与家庭收入的交互项模型。不同于“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的基本假设,疫情后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并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升(见图2)。图2选取了家庭月收入的最小值、平均值和最大值对应的疫情前后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值。可以看出,疫情后,高家庭收入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并没有显著提高;而家庭收入处于平均以及以下水平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反而显著提升。因此,从大学生的家庭收入这一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看,疫情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并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且提升程度大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这同假设2不符,支持了其对立假设(假设3)。

表2中模型2是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影响的分析模型。结果显示,不同家庭社会阶层地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在疫情发生后并没有显著变化。模型3表明,由于大学生已经成年,价值观已经成型,父辈受教育程度并不会影响大学生疫情前后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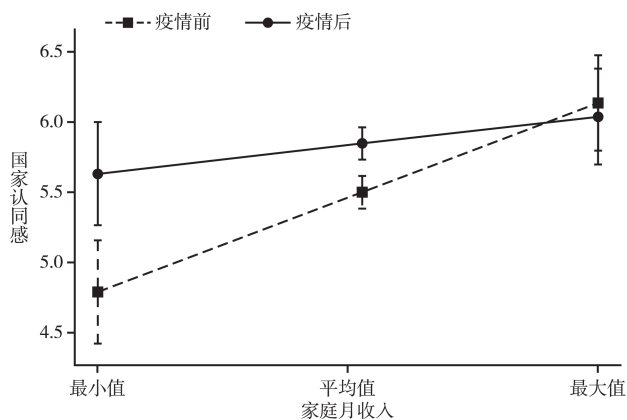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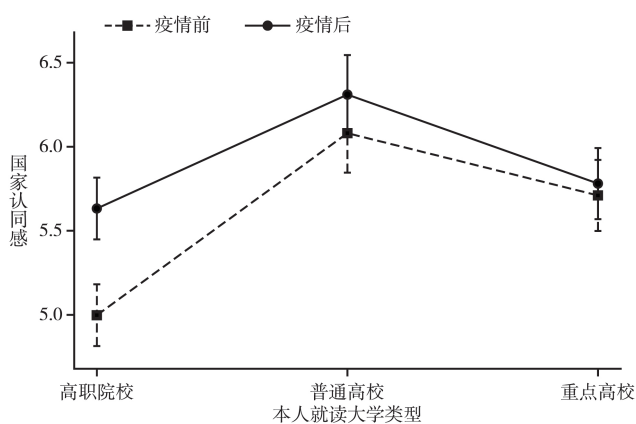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就读高校类型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变化趋势

模型4发现,就读大学类型显著影响大学生疫情前后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情况。从图3可以看出,高职院校大学生因为就业预期不明朗,国家认同感较低,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良好控制后国家认同感显著提升,且这一提升效果显著高于普通高校和重点高校大学生。这表明,从就读大学类型看,疫情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并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这一结果与家庭收入部分的结果一致。这表明,疫情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提升程度反而更大。因此,模型4的分析结果也验证了假设3,与假设2并不一致。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sup>①</sup>由于固定效应模型无法分析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因此本研究无法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只能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影响的差异。不过,这并不影响本研究主要假设的验证。

<sup>①</sup> 本研究同时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为正确模型的假设,本研究主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3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疫情后(参照项:疫情前)	0.35*** (0.07)	1.81** (0.56)	0.48*** (0.10)	0.47*** (0.09)	0.63*** (0.11)
疫情后×家庭月收入(对数)		-0.18** (0.07)			
疫情后×家庭社会阶层地位(参照项: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0.32 (0.16)		
专业技术阶层			-0.01 (0.21)		
管理阶层			-0.28 (0.24)		
疫情后×父辈受教育程度(参照项:初中及以下)					
高中				-0.24 (0.18)	
大学及以上				-0.34 (0.18)	
疫情后×本人就读大学类型(参照项:高职院校)					
普通高校					-0.41* (0.18)
重点高校					-0.56*** (0.16)
常数项	5.49*** (0.05)	5.49*** (0.05)	5.49*** (0.05)	5.49*** (0.05)	5.49*** (0.05)
观测值数	7784	7784	7784	7784	7784
个体数量	3892	3892	3892	3892	3892
R <sup>2</sup>	0.01	0.01	0.01	0.01	0.01

从表3可以看出,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与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是,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就读大学类型与新冠肺炎疫情的交互项部分,普通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提升程度部分的系数变得显著了( $-0.41$ ,  $p < 0.05$ )。不过,这并不与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分析结论不一致。

因此,固定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包括控制变量在内,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主要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基本上与固定效应模型一致;唯一有差异的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家认同感提升程度的系数是否显著。因此,整体来说,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得以验证。

#### 四、结论与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社会面临失序。出于维护自我群体的民族优越性,民众内心对政府出台高效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措施具有强烈期望。如果政府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效能低下,就会辜负民众的自我群体优越感心理,使其国家认同感降低。相反,政府

高效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措施会提高民众的国家认同感。本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 and 应急救援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符合大学生对政府的期望,维护了大学生的自我群体优越感。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且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得以显著提升。

根据“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由于掌握的财富和物质资源不足,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民众国家认同感受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消极影响更大。但本研究却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家庭经济地位较低、就读大学层次较低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提升程度反而更大。

本研究认为,这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密不可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坚持为所有患者提供免费的检测和治疗;出台相关政策确保疫情期间社会的有序运转,保证民众基本生活用品物价处于合理区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政府又扎实做好稳就业和保民生工作,克服了疫情对民众就业和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因而,“灾害社会脆弱性理论”也要充分考虑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政府灾害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效能等因素的影响。

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疫情后追踪数据收集时间为2020年3月中上旬,此时国外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人数还没有大规模增长。当一些国家面对疫情的应急管理失灵、社会治理失效与中国高效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措施相对比后,可以推论,中国政府高效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措施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提升效果仍有较大空间。

#### 参考文献:

- 金太军、姚虎 2014,《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李春玲 2010,《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19,《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李春玲、刘森林 2018,《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李强 2017,《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 马斯洛 亚伯拉罕 2012,《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尉建文、谢镇荣 2015,《灾后重建中的政府满意度——基于汶川地震的经验发现》,《社会学研究》第1期。
- 乌尔里希·贝克 2004,《风险社会:通向一种新的现代化》,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游宇、黄一凡、庄玉乙 2018,《自然灾害与政治信任:基于汶川大地震的自然实验设计》,《社会》第5期。
- 周光辉、李虎 2016,《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 Alexander, David 2012, “Models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Disasters.” *RCCS Annual Review* 4(1).
- Baum, Matthew A. 2002, “The Constituent Foundations of the Rally – Round – the – Flag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6(2).
- Elliott, James R. & Jeremy Pais 2006, “Race, Class, and Hurricane Katrina: Social Differences in Human Responses to Disast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5(2).
- Fothergill, Alice & Lori A. Peek 2004, “Poverty and Disas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view of Recent Sociological Findings.” *Natural Hazard* 32(1).
- Howell, Junia & James R. Elliott 2019, “Damages Done: The Longitudinal Impacts of Natural Hazards o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Problems* 66(3).
- Tajfel, Henri & John Turner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Stanford: Brook/Cole Publication Company.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龚 顺)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叶茂鑫)  
责任编辑:王 兵

## Articles

###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Youth's Ideal – Oriented Work Values ……… Zhang Zhuojun( 31)**

**Abstract:** Based on in – depth interviews with 38 young people , this paper takes the paths of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ity regarding the generation of values as analysis framework ,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youth group's ideal – oriented work valu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young group's ideal – oriented work values originate from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subjective intentions and the social culture's structural forces; the essence is endowing value to the work. Through the ideal – oriental values , the young people could conduct self – rationalization towards their continuous work; through the discourse narration of binary code , the social culture could create the typical image and hence frame the “ideal value” of work. Under this framework , when young people could recognize the ideal value endowed to their work by social culture and perceive that their personal value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current work , their ideal – oriented work values could be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guiding and protecting young people's ideal – oriented work values.

**Keywords:** Youth Work Values Ideal Orientation Discourse Narrative Binary Code

### **The Construction of Work Meaning among “Post – 90s” College Students in Famous Universities …………… Zhen Yajun( 41)**

**Abstract:** Employing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ociology's “toolkit” , this study conducts in – depth interviews with 70 college graduates from “double first – class”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 and interprets how the “post – 90s” receiving high – 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mobilize schema resources and construct the meanings of their own work.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interviewees commonly employ three types of cultural schemas to construct their work meaning; these cultural schemas are “status attainment/family responsibility” , “civic obligation/social value” and “personal taste/self – expression” respectively; these three types of cultural schemas have different sources and rationalizations , and hence constitute the field of meaning. In the process of job search , the interviewees mainly employ these schemas in two situations: the deeply internalized schema is usually directly activated as the goal and motivation of job search; while the actors also temporarily mobilize the specific schemas to provide the explanations for their choices after graduation. In addition , regarding the interviewees with different growth background , the schemas mobilized in job search are different , hence , the group – based differentiation begins to emerge.

**Keywords:** Work Meaning Cultural Sociology College Students Post – 90s Cultural Toolkit

### **The COVID – 19 Epidemic and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 Gong Shun & Ye Maoxin( 53)**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two waves of “Panel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COVID – 19 epidemic ,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COVID – 19 epidemic.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is generally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after the COVID – 19 epidemic has been controlled effectively , the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improves further;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from lower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 the national identity has greater improv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aster social vulnerability theory” couldn't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epidemic. This study has theoretical value and realistic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COVID – 19 Epidemic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